

丝路西安： 延续千年的交通起点

文、图 / 席会东

拥有3000年建城史和1000多年建都史的古都西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古都西安与丝绸之路休戚与共、命运相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策源地和核心区，拥有厚重的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和文明交往经验，是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参与者、推动者和见证者。



丝绸之路是古代欧亚大陆商贸往来和文明交往之路，促进了欧亚大陆的商品交换、物种传播和技术交流，推动了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欧洲文明、草原游牧文明的汇通和交融，是人类历史上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拥有3000年建城史和1000多年建都史的古都西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古都西安与丝绸之路休戚与共、命运相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策源地和核心区，拥有厚重的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和文明交往经验，是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参与者、推动者和见证者。

西域地理探索的起点

根据最早记录中原与西域交往的文献《穆天子传》记载，约公元前9世纪，周穆王在两次西征犬戎之后，从周都宗周丰镐（今西安西南部）出发，一路西行，前往昆仑丘，会见西王母。此后，周穆王继续向西北行进，在大旷原围猎，然后驰行千里，返回宗周。

近代一些学者对“西王母”的所指提出了新见解。刘师培著《〈穆天子传〉补释》认为“西王母”系译音，即古代波斯（今伊朗）；丁谦著《〈穆天子传〉地理考证》指出“西王母”是一座古城，即今伊拉克的尼尼微城；而顾实著《〈穆天子传〉西征今地考》，则认为周穆王经波斯到达了里海与黑海之间的旷原。以今天的地理来看，周穆王西游大约从陕西西安出发，经甘肃、青海，到达了新疆甚至中亚和西亚地区。

尽管《穆天子传》有传说成分，不尽可信，但从成书年代与其大致相当的《山海经》《逸周书》等古籍也可以看出，先秦时的中国古人已对我国西北地区以及中亚地区的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有了初步了解，古籍中记载的这些地区的地理知识，反映了先秦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初步交往，而这些地理知识

河南新野出土的汉画像砖
“穆天子西游图”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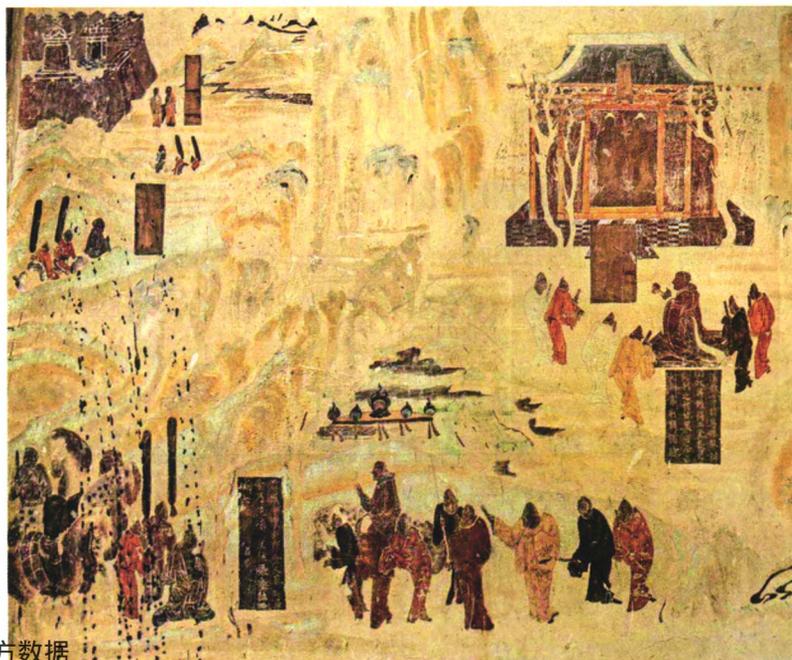
的获取正是以西安为起点。

从长安走出的使节和丝绸之路的贯通

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刘彻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联络大月氏夹击北方的匈奴。张骞历经坎坷，到达中亚的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一带）、大月氏（今塔吉克斯坦南部和阿富汗北部一带）、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等国。西汉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返回长安（今西安），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的情况，将中亚、西亚和南亚的风土人情、地理信息带回中国。

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他率领300多人，携带大量牛、羊、金帛，出使乌孙（约在天山北部和阿尔泰山之间），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又献马报谢。西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带领西域使臣返抵长安。此后，汉朝和西域各国经常互派使者，促进了双方贸易的发展，正式开通了丝绸之路的东段和中段，并最终促使横贯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和贯通，汉长安城作为丝绸之路的策源地、起点和东方文化中心，吸纳了各国的商货和商旅，藁街（在汉长安城南门外）上出现了外国商人聚居的邸舍，毛皮店里有来自域外的“狐貂裘干皮，羔羊皮干石”，毡席店中有域外的“旃席干具”，布匹店里有“榻布皮革干石”。据《东观汉记》所载，东汉光武帝逝世时，居住在长安的西域商人设帷帐以祭奠，这



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初唐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

说明汉长安城中有不少西域商人。1965年，在汉长安城内发掘出铅饼，据考释，它们是用希腊字母刻写的安息（即位于伊朗高原的帕提亚帝国）“法拉克麦”钱币。1980年在汉武帝茂陵北侧出土了刻有希腊文的圆形云龙纹铅饼，铭文意为“王中之王”。这些考古发掘为汉代长安与西方的商业文化交流提供了充分的实物证据。

随着葡萄传入中原，葡萄纹成了中原人士喜闻乐见的装饰图案。《西京杂记》记载，霍光的妻子曾送给宫廷女医淳于衍24匹织有葡萄纹样的锦缎，表明穿戴葡萄纹锦缎成为汉代长安城中的时尚。

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后，西域的作物如葡萄、苜蓿、菠菜、甘蔗、胡麻、胡豆、胡桃、胡瓜等相继传入内地，并首先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河陇、关中一带种植和推广。《西京杂记》记载汉代长安城的离宫别馆中“尽

种葡萄、苜蓿”。葡萄供人吃，苜蓿供马吃。汉武帝喜爱西域宝马，长安宫苑中也就大量种植苜蓿，用来饲养西域宝马。长安城南的上林苑有以葡萄命名的“葡萄宫”，长安城东南的乐游苑中“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随着葡萄传入中原，葡萄纹成了中原人士喜闻乐见的装饰图案。《西京杂记》记载，霍光的妻子曾送给宫廷女医淳于衍24匹织有葡萄纹样的锦缎，表明穿戴葡萄纹锦缎成为汉代长安城中的时尚。

佛教在西汉晚期从印度北部传入中亚，东汉时由中亚传入中原地区，随之西域高僧纷纷东来弘法。西晋时大月氏人竺法护、后秦时龟兹（今新疆库车）人鸠摩罗什和北周时印度摩伽陀国人阇那耶舍先后游历长安，并在此译经传法，今西安市西南户县的草堂寺内有唐代所建的鸠摩罗什舍利塔。东晋时，僧人法显于隆安三年（399年）从长安出发，经西域到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一带），游历2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14年，于义熙九年（413年）归国。自东汉起，西安成为丝绸之路上佛教交流与传播的重要一站，高僧的弘法展现了丝路法雨的绚烂。

隋唐国际大都市和文化输出地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实现了统一，为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隋文帝命宇文恺在西汉长安城的东南方设计并营建了规划严整、规模宏大的大兴城。唐朝营建大明宫，重新规划了长安城，并大力开拓西北疆域，推动了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唐朝一方面通过丝绸之路吸收外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另一方面又通过丝绸之路向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和域外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了儒家文化圈和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唐长安城则成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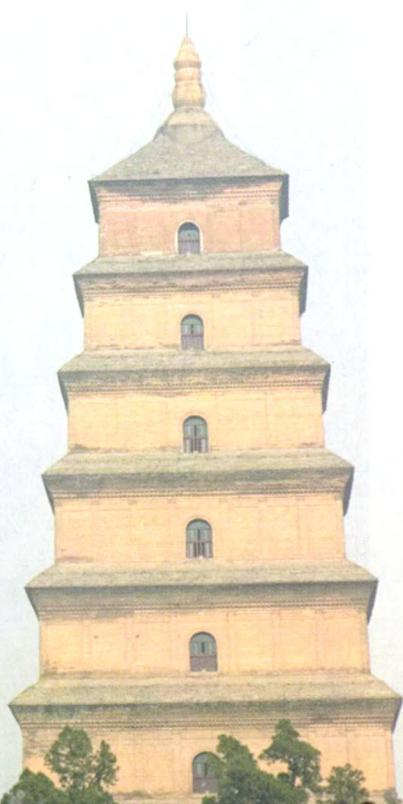
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是当时世界先进文化和价值观的汇聚地、策源地和输出地，通过丝绸之路引领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作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唐长安城中有大量胡人寓居，其中以中亚粟特人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唐长安城中胡风弥漫，胡姬、胡服、胡乐舞盛行，“胡旋舞”和“柘枝舞”在唐代宫廷、贵族和市井中都广为流传，构成长安城独特的文化景观，成为唐诗描写的重要内容。唐长安雕塑和陵墓壁画中常常出现的胡人形象包括蕃将、文职官员、使臣、商人、宗教人士、译语人、马夫、歌舞伎、仆从及驯兽师等，反映了长安的国际化程度。

唐长安的开放包容，展现出空前的隆盛辉煌气象。长安城内各国使者、

西安出土的北周安伽墓粟特袄教祭祀浮雕，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留学生、僧人等群体平等交往，佛教、道教、祆教、景教等宗教和平共处。佛教是隋唐长安城第一大宗教，唐长安城内外有100多座名寺，高僧云集，显密各宗的经论次第译出，逐渐形成各种教理和修持体系。中国佛教八大宗派，除天台宗与禅宗外，三论宗、法相宗、贤首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均创立于长安城内或城郊。其中，三论宗的祖庭草堂寺位于今西安市西南的户县终南山圭峰北麓，该宗由唐初安息国高僧吉藏在长安实际寺与定水寺（均在今西北大学校园内）所创，尊鸠摩罗什为始祖；法相宗祖庭大慈恩寺位于唐长安城晋昌坊（今西安市区雁塔路），该宗由玄奘及弟子窥基所创；密宗祖庭大兴善寺在西安市碑林区兴善寺西街，此宗由唐代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和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人不空和尚所创。长安的佛教寺院不仅是僧人诵经礼佛的场所，也是文人学士游学创作、诗词唱和以及民众礼佛交往的公共空间，还是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汇融合的场域，更是中华文化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重要源头。时至今日，我们往往能在日本京都的寺院看到唐代寺院建筑形制的影子。

除了来自印度的佛教，源自西亚波斯和叙利亚的摩尼教、祆教、景教也沿丝绸之路传入长安，被合称为“三夷教”。唐长安有5座祆教寺庙，分布于长安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和崇化坊，多位于粟特人聚居的西市和东市附近。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由聂斯脱利创立于东罗马帝国治下的叙利亚地区，5世纪受正统基督教迫害后东传波斯。唐贞观年间，波斯景教徒阿罗本来到长安，由朝廷资助，在长安城的义宁坊建立大秦寺，留下了藏于今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该碑刻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文化和波斯文化交流的历史及唐代丝绸之路多元文化流转互动的场景。

唐朝的强大和长安的繁荣，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和吸引力。日本多次组织大型使团，并派大批留学生、留学僧长期在长安学习交流，汲取先进制度和他文化。从唐贞观四年到唐乾宁元年（630—894年），日本共派出19次遣唐使，其中以学习和引进唐朝的制度、文化为主。日本遣唐使回国后，往往参与皇廷枢要，由此唐文化得以自上而下地直接影响日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日本的法律、官阶、学制、礼典都全面仿行唐制。汉字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文字的形成和发展。遣唐使还从盛唐文明中输入了音乐、医药、绘画和棋艺等方面的内容，奠定了日本生活、文化的基础。出土于西安的日本遣唐使并真成墓志铭（并真成于唐开元二十一年，即

长安的佛教寺院不仅是僧人诵经礼佛的场所，也是文人学士游学创作、诗词唱和和民众礼佛交往的公共空间，还是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汇融合的场域，更是中华文化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重要源头。

733年来到中国)，成为日本遣唐使的首例实物证明。

唐代的丝绸之路贸易和文化交流推动了沿线枢纽城市的繁荣，长安和撒马尔罕、伊斯法罕、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一样，都是丝绸之路沿线的国际性都会。隋唐长安城的规划和建筑传播到东亚各地，成为朝鲜半岛新罗都城庆州城、日本平城京（今奈良）和平安京（今京都）的规划与建筑范式。时至今日，日本京都仍保留了不少唐式建筑，并因其历史核心区保留了唐代城市规划的格局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远离贸易大通道的内陆城市

宋元以来，随着中亚、西亚陆上交通线的阻塞，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以及西北地区民族政权的分立对峙，陆上丝绸之路趋于梗阻和衰落，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欧亚大陆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经历唐末五代战乱，进入后都城时代的长安、洛阳等内陆城市相对衰落。在北宋与西夏对峙的格局下，长安成为军事重镇，其商贸交通和文化交流枢纽的地位逐渐被一批沿海港口城市——广州、泉州、宁波等取代。

13世纪，蒙元帝国的建立开启了“欧亚大陆一体化”的进程，推动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但此时的陆上丝绸之路主要以元大都（今北京）为东方起



2005年在西安市雁塔南路元王世英墓出土的驮行李陶马 图/FOTOE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策源地，古都西安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开通、发展、繁荣、鼎盛，体现了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不同族群的共生共赢、不同宗教和谐共处的丝路精神。作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西安和丝绸之路一起经历了辉煌，这份遗产和经验将会镌刻历史、关照现实、启示未来、再现辉煌。

点。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从大都到云南时途径西安，描写道“城甚壮丽，为京兆府国之都会……此城工商繁盛，产丝多，居人以制种种金锦丝绸……凡人生必需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在马可·波罗笔下，虽然京兆府城（今西安）仍是一座工商繁荣、丝绸众多的壮丽大城，但已不再是东西方丝路贸易网络的枢纽，仅仅是一座区域性城市。

明清时期，当年的长安和京兆被改称为“西安”，降格为地方和区域性城市，虽然仍是西北地区的重镇和门户，但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衰落和海上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主导海权时代的到来，西安日益成为远离东西方贸易大通道的内陆城市。

西安的丝路遗产与丝路愿景

堪称“天然历史博物馆”的西安和人类历史上重要商贸文明大通道的丝绸之路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截至2015年，西安共有2项6处世界遗产，分别是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大明宫和未央宫，其中后5处都属于“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的遗址点。

根据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现状，中国政府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中，对西安进行了合理定位，强调要发挥陕西的综合经济文化优势，将西安打造成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从而为西安再现历史时期在丝绸之路上的繁荣和辉煌提供了契机。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策源地，古都西安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开通、发展、繁荣、鼎盛，体现了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不同族群的共生共赢、不同宗教和谐共处的“丝路精神”。作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西安和丝绸之路一起经历了辉煌，走过了低谷，留下了厚重的文化遗产和历史经验，这份遗产和经验将会镌刻历史、关照现实、启示未来、再现辉煌。■